

後國語運動的語言態度——台灣年輕人 對五種華語口音的態度調查^{*}

許慧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本研究透過口語偽裝法 (verbal guise technique) 調查台灣年輕人對五種華語口音的態度，這五種口音分別為外省第二代國語、台灣華語、中國北方華語、中國南方華語、台灣國語。在過去國語運動的脈絡下，前四種都可能是「標準」國語，而台灣國語則是被貼上負面標籤的華語口音。本研究欲探討，未曾經歷過國語運動的台灣年輕世代對這五種口音的態度為何。研究結果顯示，外省第二代國語在台灣年輕人心目中的功能性評價依然最高，但在社交吸引力的評價卻最低。台灣國語得到的評價，正好和外省第二代國語相反。對於這五種口音，受試者普遍能夠判斷這幾個口音的差異。此外，受試者對於中國華語的態度相當持平，並未給予明顯的高評價，而台灣華語則是在各個面向都穩定地得到相當高的評價，且在情感或功能層面的表現差異也最小。

關鍵詞：語言態度、台灣華語、華語口音、台灣國語、口語偽裝法

^{*} 本文內容主要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台灣民眾對五種常見華語變體的語言態度研究」(MOST 104-2410-H-003-085-) 的研究成果。在此要感謝科技部的支持，以及研究助理吳庭宇、洪莞紘、郭佩靖、林和蓉、關慈音五位同學在計畫執行期間的協助。此外，還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初稿所提出的寶貴建議。

1. 前言

台灣主流的語言環境和政治環境的關係相當密切，特別是華語和台語。¹二次大戰之後，在不同的政治環境、加上國語運動以及各種口音的華語交互影響之下，華語在台灣出現了早期的外省第二代國語、台灣國語以及後來的台灣華語這三種主要口音。

在台灣早年的戒嚴環境下，「外省人」、「標準國語」、「中國人」這三個觀念，在相當程度上可說是相互連結的（許慧如 2014），至少在普遍的刻板印象中是如此。且華語在台灣經常被稱為「北京話」。對國語政策不滿者，以諷刺的口吻使用這個稱呼，而支持華語者則仍有人以「京片子」作為華語的極致表現。²但是，在國語推行運動的末期，也就是台灣華語穩定發展的同時，台灣和中國之間互不往來的時代已結束，「真正的」中國人以及中國口音也相當普遍。

本文期待理解，在現在的環境下，未曾經歷過威權時代的台灣年輕人，對於這些華語口音會抱持什麼樣的態度。

2. 名詞解釋

以下幾個名詞為本文常見詞彙，在此先定義說明，期待能更明確地規範出各詞彙的指涉。³

2.1 國語運動

本文指稱之「國語運動」，若未提供明確的脈絡說明，則是指二次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於台灣推行的語言政策，原則是延續其於中國所推行，以北平

¹ 本文原則上以「華語」指稱 *Mandarin* 這個語言，但在台灣的國語政策脈絡下出現的華語，則會以「國語」稱之。

² 但「國語」並非等同於北京話，「京片子」也不等同於標準國語，更非單純地以清楚捲舌發出ㄗㄋㄨ即可揣摩。

³ 本文有關族群與語言的詞彙，如本省人、外省人、台語等，皆是考量該詞彙目前在台灣社會的普遍性，並無特定指涉。

話為基礎所制定的標準。⁴這個國語運動在教育、媒體以及各公領域上一方面獨尊華語，一方面打壓台灣本土語言，對台灣的語言生態造成很大的影響。⁵

2.2 華語

即英文的 *Mandarin* 一詞，通常也稱為中文。台灣的國語運動中所推行的語言以及中國的普通話，廣義來說都是華語。在台灣，「國語」一詞在非嚴謹定義的狀況下，通常就是指「華語」。

但在語言社會學上，國語（*national language*）指的是語言在國家政策上的地位（*status*），並非語言的名稱，故本文於中性指稱 *Mandarin* 這個語言時，會使用「華語」一詞。

2.3 國語

若在 2.1 的國語運動脈絡下、或是涉及華語在台灣的社会意涵（如標準語）、或是固定用語（如「台灣國語」），本文則會使用「國語」一詞。

2.4 外省人

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大約台灣解嚴前後，由中國各地移民至台灣的民眾及其後代。外省人第一代絕大部分為 1949 年隨中華民國政府移至台灣，且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在語言上的差異，大約至第三代即已模糊（許慧如 2014，Hsu and Tse 2009）。

3. 背景說明

本節將詳細說明本研究幾種華語口音在台灣的角色，並作為本研究的背景說明。

⁴ 文中偶有幾處提及脈絡。包括從政策面的「國語運動」，指的是國家推動具有國家代表性的語言。至於台灣在日本時代經歷的「國語運動」提倡的國語則是日語。

⁵ 相關作法請見國立台灣文學館所整理之「台灣語言政策大事記 1895-2007」
<https://taigi.nmtl.gov.tw/archive?uid=11>，擷取時間 2019 年 8 月 12 日。

3.1 「標準國語」：從未普及過的目標口音

究竟什麼是標準國語？中華民國政府當年在制定標準國語時，有讀音統一會、國語統一籌備會等組織，具體制定國音標準。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也於台灣建立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有具體的組織規程和運動綱領（黃英哲 2007）。不過國語運動的政策及施行內容，皆非本文主題，在此略過。其實，大部分台灣民眾也不了解「標準國語」的制定過程，但是對「標準國語」大多有一個印象，就是「字正腔圓」，而這也是國語運動積極推行期間，學校教育的目標口音。

但是，國語運動下的標準國語，雖然在媒體上聽得到，不過在執行面上，標準國語可說從未在台灣普及過。從形式上來說，「國語」是以北京話為基礎所制定的，但並非等同於北京話；「國語」的標準，是人為的標準，是意識形態下的理想（黃宣範 1993: 120-122）。

即使將標準國語簡化為北京話，北京話在台灣也從未普及。Cheng (1985) 是最早分析台灣華語和北京華語差異的重要研究之一。⁶該文指出，當時在台灣被做為「標準國語」推廣的北京華語，在教學系統中其實只有音韻特徵較受重視。至於語法，就摻雜許多非北京華語的特徵了。因為二次戰後由中國來台的華語族群中，非北京華語的使用者人數較多，且政經權力較大，特別是母語為吳語的族群。且書面媒體中，中國南方華語使用者的人數遠大於北京華語，因此台灣華語的語法受到北京華語的影響較小，受到中國南方華語的影響較大。

其實，即使在音韻層面，北京話也並未實際普及過。除了因為國語運動推行初期，華語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是第二語言之外，二次戰後隨國民政府移入台灣的外省族群當中，以北京話為母語的人口也僅有相當低的比例。何萬順（2009b）、許慧如（2014）、Kuo (2005)都曾根據 1956 年戶口普查資

⁶ Cheng (1985) 所稱的台灣華語 (Taiwan Mandarin) 泛指二次戰後因台灣推行華語，由台灣本土語言（主要為台語）母語者的子女輩習得的華語。該文並未如本文或部分語言學文獻一般，進一步區分有台語口音的「台灣國語」以及沒有台語口音且目前相當普及的「台灣華語」。

料中約 93 萬外省籍人口的本籍分布，並且對照漢語方言分區，分析早年台灣外省籍人口中以北京話為母語的人口，結果顯示以北京話為母語者不到 1%。即使將範圍擴大到天津，也依然只佔外省族群人口的大約 1.5%。

也就是說，無論從形式上、或是從以北京話為母語的人口數來看，當年國語運動推行的所謂標準國語口音，都只是個目標，雖然有少數的使用者，但這種口音實際上並未普及過。

3.2 「台灣國語」：不標準口音的代表

若將華語口音的標準與否視為一個連續體（continuum），標準國語就是在這個連續體的標準端；另一個端點，也就是不標準端，就是台灣國語了。華語的標準與否這個議題，是隨著國語運動而起的。因此除了標準國語之外，不標準的國語，也應放在國語運動的脈絡下來看。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語推行政策在短時間內，積極甚至以強制性的方式推行華語，但對於當時的台灣人而言，華語可說是個全新的語言，因此當時的台灣社會進行了一場集體的華語第二語言習得（group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Winford 2003），學華語成為當時的全民運動。⁷華語做為當時大部分台灣人的第二語言，學習的時候難免會有母語口音。台語在當時不但是台灣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甚至相當程度上也是台灣不同語族之間的共通語。因此，雖然在國語運動推行時期，帶有台灣本土語言口音的華語不只有台語口音，還包括客語以及原住民語的口音，但是有台語口音的人數最多，最具代表性，也因此出現了「台灣國語」一詞。

台灣國語不是只有成人會講，在國語教育推行初期，在學學生的台灣國語口音也很普遍。主要原因是，學校老師中依然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台語的母語者。簡單地說，這些教學生講所謂標準國語的老師當中，很多人其實也是講台灣國語。

⁷ 韓石泉（1956）《六十回憶》曾描述：「光復當初，民眾對國歌之習傳，對國語之學習，俱自動參加。年屆四五旬者尤其熱心。與在日據時代，曾習得些少國語基礎。光復後不甘後人，開始重溫，曾自勵以三個月為期，使用國語演講，竟能如願以償。」

國語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推行標準國語，台灣國語也成為國語運動積極消除的口音。在這個脈絡下，「台灣國語」也幾乎成為「國語不標準」的同義詞，並且也因此被貼上負面的標籤。即使到現在，台灣年輕人幾乎已經沒有任何台灣國語的典型特徵，甚至不了解台灣國語這個詞形成的脈絡，但是這種帶有台語口音的華語，依然經常是各種演出中搞笑或醜化角色的素材，「台灣國語」根深蒂固的負面印象可見一斑。

3.3 「外省第二代國語」：對標準國語的投射

再回到標準國語議題。即使標準國語口音未曾真正普及，但台灣民眾在觀念上，受到國語運動的影響，還是有標準國語的觀念。華語在台灣也的確發展出一種台灣民眾普遍認為是標準口音的華語，因為一般認為需要標準口音的使用者，如新聞播報員、非娛樂性節目主持人等，大多使用這種口音。

由於國語運動是國民黨政府從中國帶來台灣的政策，加上當時大部分台灣民眾皆不諳華語，因此在台灣早年的戒嚴環境下，「外省人」、「標準國語」、「中國人」這三個觀念，在相當程度上可說是相互連結的（許慧如 2014），至少在普遍的刻板印象中是如此。特別是在台灣出生或是幼年來台在台灣成長的外省第二代所說的華語，就很容易被視為標準國語。

而過去也有研究證實，外省第二代的確發展出特有的華語口音。在台灣，第一代外省人的背景各不相同，其母語也是中國的南腔北調都有。但是在各種社會和政治因素的影響所形成的客觀環境下，外省人形成一個族群，且華語在第二代外省人之間也形成一種等化（*leveled*）的口音（許慧如 2014，Hsu and Tse 2009），本文稱之為「外省第二代國語」。外省第二代國語除了沒有台灣國語的語音特徵之外，在聲調表現上，外省第二代國語的聲調調域較其同儕本省人為寬（許慧如 2014）。

用一個可能過度簡化，但又能表現當時對華語口音的制式印象說法就是，外省人國語標準，本省人國語不標準，講台灣國語。不過，其實外省第二代國語與台灣國語都是台灣推行國語政策的初期產物。

3.4 「台灣華語」：沒有名字的台灣標準華語口音

外省第二代國語與標準國語之間的連結，整體來說是一般民眾之間不成文，或甚至是未意識到的共識。不過，隨著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社會和政治隔閡逐漸模糊，加上外省第二代國語及台灣國語接觸，台灣的標準國語也隨著發生微妙的變化，形成了台灣在地化的華語口音（許慧如 2014）。這種逐漸形成的標準口音，學界近年來以「台灣華語」來稱呼。

整體而言，台灣華語與目前中國華語的口音有別。長期生活在台灣的人，特別是中年以下族群大多可以分辨。台灣華語已無台灣內部的族群差異，也就是說，已無外省本省人的口音區別，且台灣華語可說是實質的台灣標準華語口音。連向來被視為必須使用標準國語的電視新聞播報員，幾乎都是台灣華語的使用者。

過去也有研究，確立了台灣華語具體的語言特徵。曾金金（1999）直接針對台灣與中國的官方電台新聞播報員的華語，進行聲學分析。該研究分析的範圍很廣，包括聲母和韻母、音節結構、聲調、重音、輕聲、兒化、語調。結果顯示，即使是語音最保守的官方電台的新聞播報員，台灣跟中國的華語語音表現，在每個項目上幾乎都有所差異。曾金金（1999）這個研究，距今已十九年，當時台灣的語言環境比現在保守許多，且該研究的發音人不但為一般視為語言保守的廣播新聞播報員，其所屬的廣播公司，在廣播電台中也屬保守。簡單地說，在保守的環境中的保守播報員，應該可以算是「標準國語」的示範者了。但即使如此，其口音還是台灣特有的口音，說明了華語在台灣已發展出其特有的標準口音。

越來越多語言學領域的研究，稱這種口音為「台灣華語」（Taiwan Mandarin），且除了上述曾金金（1999）之外，還有許多相關研究。其中，除了前述 Cheng (1985) 之外，Kubler (1985) 從語言學的各個層面分析台灣華語，也可謂台灣華語研究的先驅之一。董忠司（1995）則從語音及聲韻，分析台灣漢語方言對台灣華語的聲母所造成之變體。前述兩個研究皆以作者描述性的語料為討論對象。近年來，Fon and Chiang (1999)、Fon and Johnson (2004)、Fon et al. (2004)、Fon and Hsu (2007)、Hsu and Tse (2009) 等研究，則

利用聲學分析，透過研究實證，進一步提出台灣華語和中國華語在聲調上的差異。除了語音及音韻層面的獨立性，還有詞彙（如姚榮松 2000）、句法（如曾心怡 2003）等不同角度的語言研究，都支持了台灣華語的獨立性。除此之外，何萬順（2009a, 2009b）則從語言學、台灣華語的人口、台灣人的語言態度這三個角度分析，主張台灣華語已經是台灣本土語言。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華語雖然已是穩定的華語變體，且也可視為台灣的標準華語口音。但是，「台灣華語」一詞幾乎只有在語言學領域中出現，甚至在語言學領域中，這個詞彙也並未真正普及。

3.5 「標準國語」與「台灣華語」之間的矛盾

由上述關於「標準國語」及「台灣華語」的論述可以看出，標準的華語口音在台灣的情況是，許多民眾從小印象中的「標準國語」幾乎不曾存在；而現實環境中，大部分人認可為標準口音的華語，也就是「台灣華語」，卻未形成具體的觀念。簡單地說，就是想像中的標準華語不存在，但實際上認知的標準華語卻沒有名稱，因此，「國語」很標準的人（講標準台灣華語），卻可能不是講「標準國語」。

換句話說，台灣華語各種口音的現狀是，大部分人講的標準口音（台灣華語），跟大部分人認知的口音（標準國語），這兩者沒有交集。因此目前還是很常聽到民眾以「標準國語」或「台灣國語」來評價自己或別人的華語口音（或發音）。此論文在收集語料時，若請發音人講華語，許多人經常會不好意思地表示「可是我國語不標準耶！」、「可是有人說我台灣國語耶！」，但其實有這種反應的人當中，有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講的是台灣華語，也就是目前台灣最普遍的口音。但因收集語料多半需要錄音，且是學術研究需要的錄音，因此大部分受試者會認為要有「標準」或「正式」的口音。

3.6 中國的華語比較標準？

台灣的國語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年代，大約和台灣的戒嚴時期重疊，當時的媒體和教育體系，不斷推廣標準國語以及中國人認同。但是，在戒嚴

時期，台灣和中國不但沒有往來，來自中國的資訊也都是禁忌。在這個氣氛下，過去台灣人以外省人作為中國人的投射，並且以外省第二代國語作為標準國語的想像，大致形成了「外省人—中國人—標準國語」的連結。

目前，台灣已經解嚴超過三十年，台灣人的中國人認同早已大幅弱化，⁸華語也在台灣發展出在地的標準口音，也就是台灣華語。但是許多台灣人，特別是經歷過戒嚴時期的台灣人，似乎仍直覺地視中國人的華語為較標準的口音。這些民眾以華語和中國人交談時，常會有誇張的捲舌音或是聲調起伏，看得出他們希望在口音上配合（accommodate）中國人的口音。但是這樣的配合，卻少見於和其他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華語人的對話。可見即使華語在台灣早已高度普及，甚至已發展出台灣華語的實質的標準口音，台灣人對於自身的華語以及中國的華語，似乎還是抱有些許複雜的情結。

4. 文獻回顧

關於語言態度的研究相當多，本文回顧的內容，聚焦於三個重點。第一，是和台灣的華語相關的語言態度研究，第二，是關於同一語言不同口音的相關研究，第三，是相關研究方法。其中，第一點是本文部分的研究動機。第二點及第三點則是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根據。

4.1 台灣的華語語言態度相關研究

國內關於華語的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的相關研究，大多是與其他本土語言進行的比較，單獨針對華語進行的調查較少。在此介紹幾個最近的研究。

蔡仲茵（2014）或許是最新的相關研究。該研究調查台北和高雄的大學生，對華語及台語的使用及態度。結果顯示，無論是台語能力或是對台語的

⁸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 2019 年 7 月公布的〈臺灣民眾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 (1992.06-2019.06)〉，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認同，從 1992 年的 25.5% 一路降到 2019 年的不到 4%，而台灣人認同，則是從 17.6% 上升到 56.3%。2019 年 8 月 11 日，取自 <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6>

評價，高雄的大學生皆高於台北的大學生，這個結果其實並不令人意外。不過還有一點值得注意，該研究發現，全體受試者的台語使用程度皆相當低。這個發現與許多人對南部台語普遍的印象是有出入的。此外，無論台北或高雄的受試者，皆普遍認為華語比台語有價值、有活力、較不複雜。最後更提出，語言使用未必和語言態度相符，也就是說，對能夠使用多種語言的人來說，即使對其中一種語言有正面的態度也未必會積極地使用該語言。

鄭安秀（2009）也是針對台北與高雄兩地，以問卷調查進行語言使用與態度的研究。該研究的調查範圍和年齡層較廣，受訪者的職業共有七大類，年齡層則跨了老中青三代，總共完成了 480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大多不令人意外，整體來說，北高兩地的語言環境，都還是繼續往華語靠攏，也就是說往華語的語言變遷仍在持續當中。相關的研究結果包括：語言的傳承逐漸不再以母語（在該研究中指的是台語）為首選、青年層的第一習得語未必為台語、老年層在與孫輩溝通時也開始使用華語等。不過，該研究仍有較新的發現。該研究的受訪者，雖然語言使用上明顯傾向華語，但在情感與價值觀的語言使用選擇（如身在異鄉時使用的語言），卻是傾向於使用台語。更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層對台語的傾向反而較中年層明顯。

陳淑嬌（2007）大規模地調查了台灣各語言的活力，包括華語、台語、客語、英語、原住民語等。調查結果並不令人意外，除了六十歲以上的年齡層外，台灣人的華語能力已經不分族群、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也不分場合與功能，華語已經佔了絕對優勢。至於台灣本土語言的跨世代傳承，仍然不理想。不過，所有台灣的族群語言的能力與使用，大致上不再區分教育程度與職業，顯示族群語言的地位及價值仍受重視，使用族群母語不再被視為社會地位低下或教育程度不足。

鄂貞君（2002）探討民眾在台灣目前「世界化」與「本土化」兩個方向並存的環境下，民眾對語言教育政策及第二官方語言，抱持何種態度？英語較適合、還是本土語言較適合？該研究採用直接問卷調查法，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英語及本土語言的推廣和重要性都抱持正面的態度。另外，關於台灣的官方語言及國家語言，超過六成的受訪者依然認為是華語，贊成英語

者只有大約五成。至於本土語言是否該擁有官方語言或國家語言的地位，結果顯示，雖然個人的母語和其族群屬性之間有情感依附，但是本土語族的成員似乎並未強烈期望其族群語言成為台灣的官方語言或國家語言。

王甫昌（2001）曾調查了台灣四大族群對台灣不同語言的態度，結果顯示，民眾認為華語最優美，其次是台語，再來是客語，但是華語和台語之間的差異並不明顯。

關於華語口音的語言態度研究相當少，江素華（2010）及任承英（1999）是少數的相關研究。江素華（2010）是少數針對台灣的華語世代（以華語為主要語言甚至是母語者）的語音所做的華語研究，其中包括語言態度。該研究抽樣三十位台灣青少年以及三十位五十歲以上的台灣年長者，除了分析其語音資料外，也分析他們對台灣國語、標準國語、北京華語，這三種華語的態度。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的長輩都了解自己的華語是有台語口音的，但他們也多認為這種台灣國語腔調很親切，也有多人認為台灣人說北京腔是裝腔作勢的行為。至於青少年受訪者，則是大多認為自己講的是接近標準的國語，北京華語並不受到這些青少年認同。

任承英（1999）意識到，台灣民眾大多能意識到台灣人跟中國人說的華語是有不同腔調的。因此利用這兩種華語的差異，設計實驗以研究台灣人聽辨中國普通話腔調時的感知因素，結果發現，在捲舌音、兒化韻、輕聲這三個變項都會影響受試者對中國普通話的感知，且輕聲的影響力最大。另外，該研究也利用偽裝配對法，探討不同母語背景及性別，對華語口音所引發出的態度。

4.2 同語言不同口音的語言態度研究

本小節回顧的相關研究，都是同語言不同口音的語言態度研究。除了部分是針對復振後的威爾斯語之外，大部分是針對英語口音。這些英語口音，有些是單純的地方口音（如英國大部分的地方口音、美國英語……），有些是族群口音（如蘇格蘭、威爾斯等），有些則是移民者受到其母語影響的口音。

Coupland and Bishop (2007) 針對英國不同口音的英語進行語言態度的調查。該研究利用現有的英語口音資料庫，調查了 34 種不同口音，且利用網路進行調查，總共得到 5,010 位不同背景的受訪者的回覆，調查規模可謂相當龐大。其中有幾個研究結果相當值得一提。首先，相較於中老年族群，年輕人對於「標準」(standard) 口音和社會優勢性之間的連結，較不明顯。此外，受試者對於和自己認同的歸屬地相同的口音 (the accent identical to own) 的評價相當高。另外，北愛爾蘭、威爾斯、蘇格蘭這三個賽爾提克族裔色彩明顯的地區，對於標準口音的評價最低。這些結果都顯示了標準口音以及族群認同，都影響了英國民眾對口音的態度。

其實，關於內團體 (ingroup) 與外團體 (outgroup) 認同與語言態度的關係，Abrams and Hogg (1987) 也曾針對蘇格蘭和 RP (Received Pronunciation) 英語進行過相關研究。不僅如此，該研究採用的蘇格蘭口音，還細分為鄧迪 (Dundee) 及格拉斯哥 (Glasgow) 口音。並且以偽裝配對法，對鄧迪地區的青少年施測。結果顯示，受試者對於這三種口音的語言態度，明顯受到其自我認同的影響：內團體口音的評價最高，外團體的評價最低；且內團體與外團體的認定，是會隨著相對的環境而改變。因此，受試者對 RP 英語的評價最低，至於鄧迪口音的英語以及格拉斯哥口音的英語，由於兩者皆為蘇格蘭口音的英語，因此兩地互為外團體。

Ladegaard and Sachdev (2006) 針對丹麥的英語學習者進行英語口音態度的調查，期待能夠了解，在強勢美國文化影響、普及的英式英語教學這兩項因素的碰撞之下，丹麥年輕人對美式英語和英式英語的態度為何，結果顯示，丹麥年輕人雖然接受美式文化，但在口音上仍然較偏愛丹麥傳統上較普遍的英式英語口音。

Robert (2009) 則是和威爾斯語復振運動成果相關的語言態度研究，該研究調查威爾斯民眾，對威爾斯語的母語者及第二語言使用者的口音所抱持的態度。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 L1 或是 L2 使用者，威爾斯語的流利程度，對受試者的影響最明顯。發音人若能講流利的威爾斯語，則在社交吸引力和社會聲望，都得到較高的評價。

上述研究除了研究主題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方法。針對不同口音的語言態度研究，要考慮的研究方法有兩個面向，第一是語料的呈現方式，第二個是探究態度的方式。關於這兩個面向，本文在第六節「研究方法」會有進一步說明。

4.3 不同口音的語言態度研究方法

語言態度的研究方法，除了常用的直接問卷或訪談之外，還有許多是由社會心理學領域發展而來的。其中 Lambert et al. (1960) 提出的偽裝配對法 (matched guise technique) 對這個領域的研究影響很大。偽裝配對法最大的特色就是借重雙語人的雙語（包括口音）能力。由同一位雙語發音人，以其熟悉的兩種語言，分別錄製內容相同的語料。受試者聽過這些不同語言或口音的語料後，需表達對發音人的各種評價，但實驗過程中，受試者未被告知這些語料的發音人為同一人。

偽裝配對法有其先天上的限制，因為個人的雙語程度要達到完全平衡，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近幾年的研究，大多會根據研究主題及研究條件，修正偽裝配對法的作法，期待能夠更平衡中性地呈現語料，讓受試者能夠在儘量僅針對各研究要探索的變項表達態度。其中，口語偽裝法是常見的做法。

4.3.1 口語偽裝法 (verbal guise technique)

口語偽裝法是改良自偽裝配對法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偽裝配對法最大的爭議點就是符合條件的發音人極難尋，即使是雙語人，兩種語言的能力也幾乎不可能一樣。口語偽裝法實驗則是採用多位發音人的語音，每位發音人各代表一種口音或語言 (verbal guise)。除了口音或語言之外，其他的因素都盡量控制，期能將發音人之間的個人差異降到最低，如發音人的性別、年齡(因生理因素會影響音質或音色)、發言內容、教育程度、該語言能力……等。透過這些實驗設計，讓受試者幾乎完全針對該研究欲調查的語言或口音表達態度。這種實驗方式，已獲得過去許多研究採用。舉例來說，Ladegaard

and Sachdev (2006) 是以不同英語口音的母語者為發音人，而非同一發音人講不同口音的英語。但是對語料內容加以控制，期能兼顧語料自然度及內容的一致性，以提升語言態度測驗的可信度。Robert (2009) 也是採用不同口音及母語程度（以威爾斯語為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的威爾斯語發音人的語料，但是所有發音人的年齡與性別都一致，語料內容為有限度控制主題的對話，以求兼顧語料內容的同質性與語料的自然程度，藉此降低非語言因素對受試者的影響。

4.3.2 問卷設計的原則

至於受試者的實際態度，有些是透過觀察，但大多還是透過問卷。因此問卷的設計相當重要。除了直接問題之外，許多研究會採用間接問題，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探究受試者真實的內心想法。

關於語言態度的問卷設計，Zahn and Hooper (1985) 是許多研究的根據。該文的重要性有二，其一是對各種常用語言態度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徹底的回顧與分析；其二是透過這些分析結果，針對前人的研究方法去蕪存菁，並進一步發展出一套更值得信賴的評鑑方法，也就是語言評估準則（Speech Evaluation Instrument, SEI）。

語言評估準則從三大面向分析受試者對發音人的態度，分別是發音人的社會優越性（superiority）、社交吸引力（social attractiveness）、動能性（dynamism）。每個面向之下都還細分多項指標，如社會優越性之下有教育程度、財富程度、社會階級等；社交吸引力之下有信賴程度、性格等；動能性之下有活動創造性、自我表現能力等等。語言評估準則發表之後，許多研究都採用這套指標，有些也做過些許修正。前述的 Coupland and Bishop (2007)、Ladegaard and Sachdev (2006)、Robert (2009)、Zhang (2013) 等，都是採用 SEI 的觀點，來調查受訪者對不同口音的語言態度。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許多語言態度研究皆採用語言評估準則來設計問卷問題，但其實做法都不盡相同，大多會根據各研究的內容和條件而有

所調整，而調整的方向則多半是問卷題目的數量和面向。舉例來說，許多研究只探討社交吸引力及社會優越性這兩個面向，且對這兩個面向的使用名稱，也不一樣。

如 Coupland and Bishop (2007)，總共只有兩個問題，社交吸引力和社會優越性各一題，且該研究對於社會優越性，使用的是 *privilege* 這個名稱。Zhang (2013) 也是只調查社交吸引力和社會優越性這兩個面向，而該研究使用的名稱則分別為 *solidarity* 以及 *status*。Ladegaard and Sachdev (2006)則是採用了三個面向：社交吸引力、社會優越性、語言能力，該研究使用的名稱分別為 *social attractiveness and personal integrity*、*social status and competence*、*quality of language*，且每個面向各有五個題目。Robert (2009)的問卷問題則包含四個面向：社交吸引力、社會優越性、語言能力、族群代表性。其中，「社會優越性」使用的是 *prestige* 這個名稱。此外，由於該研究調查的語言口音是威爾斯語，是一個復振中的語言，研究中的發音人有些是威爾斯語的第二語言使用者，且語言的復振也伴隨了文化和認同議題，因此該研究還增加了語言能力(*competence*)和族群代表性(*perceived ethnicity*)這兩個面向。這四個面向的問題數量也不盡相同，社交吸引力、社會優越性、語言能力、族群代表性的問題數量分別為兩題、兩題、四題、一題。

5. 研究問題

本文第三節所提及的幾個華語口音，都有其社會脈絡，但台灣解嚴後出生的年輕世代，未曾經歷這些社會脈絡。對這些年輕人來說，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台灣已是華語普及的社會，上述這些華語口音就已常態地存在其生活之中。且其中除了台灣國語，被呈現出一些親切、搞笑、老人等刻板印象之外，其他的口音，若以國語運動時期普遍但過度簡化的「標準 vs. 不標準」來看，似乎都是某種程度的「標準」口音，也就是普遍可接受的口音。

本研究有以下兩個具體的研究問題：

- (1) 外省第二代國語、台灣華語、中國北方華語，中國南方華語何者是目前台灣年輕人心中的評價最高的華語口音？
- (2) 從威權時代就一直受到負面評價的台灣國語，對於未曾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台灣年輕人來說，是否仍存有負面的印象？

6.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口語偽裝法，以間接問卷探知受試者對這幾種華語口音的態度。間接問卷則是根據 Zahn and Hooper (1985) 提出的 SEI 所設計的。

6.1 發音人

本研究調查的華語口音有五種，分別是外省第二代國語、中國北方華語（以下簡稱北方華語）、中國南方華語（以下簡稱南方華語）、台灣華語、台灣國語。每一種口音由一位發音人提供語料。

所有發音人皆為女性。其中，台灣華語、北方華語、南方華語的發音人年齡皆介於 20-23 歲；外省第二代國語及台灣國語，有其世代特殊性，發音人皆 60 多歲。在華語能力方面，除了台灣國語之外，其他四位發音人皆視華語為母語，且以華語為主要生活語言。至於台灣國語發音人，其母語雖為台語，但華語依然是其生活及工作上主要語言之一，因此其華語雖帶有台語口音，但流利程度與其他四位發音人無明顯差異。而這也是許多該世代台語人的語言使用現狀，本發音人並非特例。

6.2 語料

本研究提供一個四格漫畫給不同口音的發音人，漫畫旁列有幾個提示詞。該漫畫主要內容為一位小學生早上起床到出門上學這段時間的生活習慣。發音人以華語說明漫畫內容，且需要使用上述之提示詞。

在語料設計上，主要的考量有三點：語料的自發性（spontaneity）、用詞的同質性及中性的語料內容。發音人在經過準備之後，各自表達漫畫的內容而非讀稿，透過這個方式以提高語料的自發性。另外，本研究提供每位發音人相同的漫畫以及提示詞，藉以提升語料內容的同質性。而選擇這個主題則是考量了這個主題不具明顯的價值判斷，以避免不同的語料內容可能對語言態度造成的影響。

6.3 受試者

本研究共有 120 位受試者，男女各半，年齡皆為 21-30 歲（男性平均年齡為 24.2，SD=2.7；女性平均年齡為 23.5，SD=2.2），所有受試者皆在台灣出生長大，皆以華語為最主要的生活語言，且 18 歲之前從未在其他國家連續居住超過六個月，且皆為大專在學或具有大專畢業以上之學歷。所有受試者皆未參加確認口音差異的前測。

6.4 問卷

本研究的問卷共有九題，前七題為封閉式問題，後兩題為開放式問題。封閉式問題探究受試者的語言態度，主要參考 Robert (2009) 的設計，並考量現況調整題目內容。本研究七個問題分為三大類，分別為社交吸引力（social attractiveness）、社會聲望（prestige）、語言能力（competence）。開放式問題，則為了解受試者是否能夠辨識這幾種口音。以下為本研究所採用的問卷題目。

（1）你喜歡這個人講的華語嗎？

- （1）☐非常不喜歡 （2）☐不喜歡 （3）☐普通 （4）☐喜歡
（5）☐非常喜歡

（2）你覺得這個人的華語是她的母語嗎？

-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普通 （4）☐同意
（5）☐非常同意

- (3) 你覺得這個人在求學時的表現如何？
(1) ☐非常不好 (2) ☐不好 (3) ☐普通 (4) ☐好 (5) ☐非常好
- (4) 你覺得這個人的工作能力如何？
(1) ☐非常不好 (2) ☐不好 (3) ☐普通 (4) ☐好 (5) ☐非常好
- (5) 你覺得這個人的華語標準嗎？
(1) ☐非常不正統 (2) ☐不正統 (3) ☐普通 (4) ☐正統
(5) ☐非常正統
- (6) 你覺得這個人親切嗎？
(1) ☐非常不親切 (2) ☐不親切 (3) ☐普通 (4) ☐親切
(5) ☐非常親切
- (7) 你覺得這個人用華語討論專業議題的流利程度如何？
(1) ☐非常不流利 (2) ☐不流利 (3) ☐普通 (4) ☐流利
(5) ☐非常流利
- (8) 你覺得這個人是哪個地方或哪個族群的人？
- (9) 你覺得這個人還會說哪種語言？

其中屬於社交吸引力的問題為(1)及(6)，屬於社會聲望的問題為(3)及(4)，屬於語言能力的問題則為(2)、(5)與(7)。

6.5 施測過程

研究團隊除了口頭說明施測的過程及方法之外，還會進行一次模擬測試，並確認受試者已了解施測過程才會正式施測。模擬測試播放的音檔，無論發音人或語料內容，皆與實測完全不同。受試者每聽完一個音檔之後，就會填寫上述的問卷，待問卷完成後，再繼續播放音檔填寫問卷的程序，直到五個音檔播放完成。

每個音檔的長度，取決於發音人講話的速度及內容。但由於發音人必須根據同一張四格漫畫描述，且還需要講到漫畫旁的提示詞，因此內容差異不大。另外，需要特別一提的是，受試者並未被告知播放的音檔為哪一種口音。

7. 結果

如本文第 6.4 小節所述，本研究的問卷包含封閉式問題及開放式問題。本節將分別呈現並探討這兩類問題的分析結果。

7.1. 封閉式問題

問卷上的每一個問題，我們皆針對受試者填寫的問卷結果，以口音為受試者內變項 (within-subject variable)、性別為受試者間變項 (between-subject variable)，進行雙因子混合變異數分析 (two-way mixed ANOVA)，請見表一。

表一 本研究間接問題統計結果

						事後配對比較 ⁹			
	性別 F(1,118)	<i>p</i>	口音 F(4,472)	<i>p</i>	外省第二 代國語	北方 華語	南方 華語	台灣 華語	台灣 國語
社交吸引力									
喜歡	1.30	.26	11.07	.000	3.6 ^a	2.9 ^b	3.0 ^b	3.4 ^a	3.0 ^b
親切	.18	.67	47.63	.000	2.9 ^c	3.2 ^b	2.9 ^c	3.1 ^b	4.2 ^a
社會聲望									
求學	.02	.90	78.10	.000	4.0 ^a	3.7 ^b	3.7 ^b	3.6 ^b	2.7 ^c
工作	.75	.39	42.33	.000	4.0 ^a	3.7 ^b	3.6 ^b	3.5 ^b	3.0 ^c
語言能力									
母語	.00	1.00	109.12	.000	4.5 ^a	4.1 ^b	4.3 ^b	4.4 ^a	2.6 ^c
標準	.03	.87	162.37	.000	4.2 ^a	3.9 ^b	4.1 ^{a,b}	4.2 ^a	2.2 ^c
專業 議題	.03	.87	206.22	.000	4.4 ^a	4.2 ^b	4.2 ^b	4.1 ^b	2.2 ^c

結果顯示，口音變項在每一個問題上皆呈現顯著差異，性別則皆無顯著差異 ($p > .001$)。我們針對口音進行事後配對比較 (post hoc pairwise comparison)，表二整理了事後配對比較的結果。

⁹ 事後配對比較欄下資料格內顯示的，為受試者在該題對各口音評價的平均數。數字上方之字母，顯示該列各口音之間顯著差異之關係。

表二 間接問題的事後配對比較結果

社交吸 親切	[台灣國語]	>	[台灣華語 、 北方華語]	>	[南方華語 、 外省第二代國語]
引力 喜歡	[外省第二代國語]	>	[台灣華語]	>	[北方華語 、 南方華語 、 台灣國語]
社會 求學	[外省第二代國語]	>	[台灣華語 、 北方華語 、 南方華語]	>	[台灣國語]
聲望 工作	[外省第二代國語]	>	[台灣華語 、 北方華語 、 南方華語]	>	[台灣國語]
母語	[外省第二代國語]	>	[台灣華語]	>	[北方華語 、 南方華語]
語言 標準	[外省第二代國語]	>	[台灣華語]	>	[南方華語] > [北方華語]
能力 專業	[外省第二代國語]	>	[台灣華語 、 北方華語 、 南方華語]	>	[台灣國語]
議題					

從這部份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幾個現象。

(1) 外省第二代國語與台灣國語的對立印象仍存在

外省第二代國語、台灣國語、台灣華語，這三個在二次戰後在台灣形成的華語口音，除了在親切這個面向之外，在每個面向得到的評價排序都一樣。外省第二代國語得到的評價最高，台灣華語有時和外省第二代國語之間沒有顯著差異，有時僅次於外省第二代國語，而台灣國語得到的評價依然是最低的。也就是說，「外省第二代的國語為標準國語，本省人則講台灣國語」的印象顯然還是存在於台灣社會。本研究的受試者都是未經歷過國語推行運動時代的年輕世代，且施測過程中也未透露發音人的背景。但即使如此，他們對這兩種口音的態度和台灣社會長期的刻板印象，沒有明顯差異。

(2) 「親切」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外省第二代國語和台灣國語這兩種口音，在「親切」這個面向上得到的評價正好相反。本問卷的評價量表以 5 為最高評價，1 為最低評價，台灣國語在「親切」這個面向上得到平均 4.2 的高評價，但在其他面向的評價，則都不超過 3，也就是量表的中間值，更有多項低於 3。而外省第二代國語則恰恰相反，外省第二代國語幾乎在每一個面向都得到最高的評價，且大多超過 4.0，但是在「親切」面向上得到的評價不但敬陪末座，而且得到的評價還低於 3。

這兩個口音皆是在台灣發展出來的華語口音，但有明顯的族群色彩。在國語運動時期的社會環境中，外省人和佔台灣最大人口比例的台語母語族群，不可諱言地有相當程度地對立，因此在訴求情感的「親切」面向和訴求其他功能、專業等非情感成分的面向上，有對立的表現，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也顯示出，受試者在對華語口音的態度上，「親切」似乎是專業的反義詞，甚至是負面評價的委婉說法。

（3）中國華語的評價不高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結果，那就是中國口音的華語。華語是來自中國的語言，特別是台灣在威權時期大中國意識的環境下，還建立了中國人和標準國語之間的連結。那個脈絡下的「中國人」並未精確以客觀條件定義過，但當時台灣和中國互不往來，且在政治和社會因素（如省籍的認定）的影響下，「外省人」幾乎就是當時大部分台灣人對「中國人」的想像。

目前的台灣，「真正的」中國人所講的華語，早已是許多台灣人生活中的常見口音。但是本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華語，無論是中國南方或是北方的口音，受試者在各方面的評價皆低於對外省第二代國語的評價。

外省第二代國語世代的發音人年齡偏高，拿來和本研究年輕世代發音人的中國口音相比或許不夠嚴謹。不過，我們可以比較本研究發音人年齡較接近的台灣華語及以及兩個中國華語口音。結果顯示，台灣華語在部分項目獲得的評價和兩個中國華語之間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其他項目皆顯示優於兩個中國華語。至於中國南北兩地的華語口音之間，除了親切和標準這兩個面向有些微的差異之外，在其他面向上獲得的評價則是沒有顯著差異。

（4）穩定的台灣華語

從表一和表二可以看到，台灣華語在每一個面向上得到的評價相當一致，不是最高就是次高的評價。且即使在「親切」這個面向的表現也是如此，這點和外省第二代國語和台灣國語有所不同。

且外省第二代國語和台灣國語皆為過渡性口音，有這兩種口音的人，目前至少都是五十歲左右的壯年，更有不少已進入老年期。

外省第二代國語以及台灣國語逐漸凋零，台灣華語受到年輕人穩定支持，且中國口音得到的評價不如台灣華語。在這樣的條件下，可以預期台灣華語在台灣的主流地位將會更為穩定。

7.2 開放式問題

問卷第八題及第九題為開放式問題，故回答的類型及數量不一。表三及表四分別整理了第八題和第九題的結果。

表三 問卷第八題「你覺得這個人是哪個地方或哪種族群的人？」

回答結果統計									
外省第二代國語		台灣華語		台灣國語		中國北方		中國南方	
地區/族群	%	地區/族群	%	地區/族群	%	地區/族群	%	地區/族群	%
台北	40.3	台灣	45.9	台灣	54.0	中國	82.5	中國	84.4
台灣	35.5	台北	26.2	南部	21.0	北京	8.7	北京	7.4
外省	11.3	不知道	9.8	中南部	7.3	中國北方	2.4	上海	2.5
不知道	4.8	台中	5.7	台南	6.5	上海	1.6	外省人	2.5
客家	3.2	南部	4.1	雲林	3.2	外省	1.6	中國南方	1.6
台中	2.4	台南	1.6	台中	1.6	香港	1.6	不知道	0.8
中國南方	0.8	客家	1.6	台北	1.6	不知道	0.8	中國北方	0.8
南部	0.8	中部	0.8	不知道	0.8	客家	0.8		
都市	0.8	中南部	0.8	台灣鄉下	0.8				
		高雄	0.8	東南亞	0.8				
		彰化	0.8	客家	0.8				
		花蓮	0.8	屏東	0.8				
		外省	0.8	高雄	0.8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表三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受試者可以清楚分辨台灣的華語口音和中國的華語口音。即使是外省第二代國語，也有超過九成的受試者認為是台灣的口音（台北、台灣、外省、台中、南部），只有不到 1% 的受試者認為是中國口音。而兩個中國華語口音，也都有超過九成的受試者能辨識出中國口音。

此外，研究結果也顯示，「台北人講標準國語」、「中南部人國語不標準」這樣的刻板印象，也還存在。在標準口音方面，無論是外省第二代國語或是

台灣華語，除了「台灣」這個比較大範圍的回答之外，在具體的城市會區域的回答中，「台北」佔了很大的比例。而關於台灣國語的區域判斷，則大多為中南部。

表四 問卷第九題「你覺得這個人還會說哪種語言？」回答結果統計

外省第二代華語		台灣華語		台灣國語		中國北方		中國南方	
	%		%		%		%		%
英語	51.6	台語	39.3	台語	98.4	英語	31.0	英語	38.5
台語	20.2	英語	36.1	日語	0.8	北京話	18.3	中國方言	23.0
無	12.1	不知道	11.5	越南語	0.8	中國方言	13.5	無	17.2
不知道	9.7	無	9.0			無	12.7	不知道	7.4
客語	3.2	客語	3.3			廣東話	8.7	北京話	7.4
上海話	1.6	日語	0.8			不知道	7.9	廣東話	4.1
日語	0.8					上海話	4.8	上海話	1.6
山東話	0.8					山東話	1.6	韓語	0.8
						台語	0.8		
						四川話	0.8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從表四的統計結果則可以發現，受試者傾向將「廣義」的標準華語——外省第二代國語、台灣華語、北方華語、南方華語和英語連結，但台灣國語則一面倒地連結到台語。

此外，這題的結果也可以確認受試者不但能夠分辨台灣的華語（外省第二代國語、台灣華語）和中國的華語（北方華語、南方華語），還能夠分辨外省第二代國語以及台灣華語這兩個台灣的華語。如前所述，受試者傾向將標準華語和英語連結，台語則無。在外省第二代國語和台灣華語這兩個堪稱台灣兩種標準華語口音，也可以觀察到這個傾向。從表四可以看出，有超過50%的受試者將外省第二代國語連結到英語，只有20%連結到台語，但對於台灣華語，則連結到台語的比例就多了將近一倍。

另外，受試者在面對台灣華語、北方華語、南方華語這三種年輕發音人的語料時，也可以明顯判斷出台灣口音和中國口音。受試者推測台灣華語發

音人可能會的語言當中，台語的比例最高。但是對兩個中國口音，受試者聯想到的語言，除了英語之外，幾乎全都是中國方言。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九題被提及的中國方言當中，除了常和國語相提並論的北京話之外，就只有山東話、廣東話、上海話、四川話，這四種中國方言，幾乎就是台灣早年透過外省人所認識的中國方言。

8. 討論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出，台灣年輕一代對華語的態度，似乎仍受到保守價值的影響，但也慢慢地發展出新的價值。

8.1 國語運動的影響——認同既有標準口音

首先，除了「親切」面向之外，台灣的年輕世代依然給予外省第二代國語最高的評價，而台灣國語得到的評價還是最低。顯然，即使在強調多元價值的今天，台灣年輕人心目中，不但還是認同標準口音，而且對標準口音的認定，還是相當一致。可見國語運動時期發展出來的刻板印象，還是存在。

這種追求標準語的意識形態，其實在許多語言都存在。Milroy (2001: 530) 就指出，這些語言的使用者，都受到「標準語文化」(standard language cultures) 的影響，而這個標準語的形成，許多是透過得到歷史語言學的詮釋權，再進一步進到學校、政府等體制，英語就是一例。該文還指出，受到標準語文化影響的語言使用者，對於標準語的認同，不只是對自己的語言，還擴及到其他語言。簡言之，受到標準語文化影響的人，傾向於認為每個語言都有標準語。即使是語言學的研究，也很容易受到標準語文化的制約。

標準語文化在台灣社會的表現，的確也都呼應了上述 Milroy (2001) 的兩個論點。台灣在日本時代以及二次戰後都經歷過「國語」政策，先是日語、後是華語，且這兩次國語政策中的國語，無論是日語或是華語，都未曾在台灣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而是直接透過政治力強加的外來語言。比起英語這種透過歷史跟文化發展，潛移默化而形塑出的標準語文化，台灣社會的標準語

文化，是在短時間內，以強制的方式建構起來，也因此更容易具體感受到「標準」的存在及地位。

此外，台灣的標準語文化，除了華語，似乎也影響了台語。Hsu (2018) 調查了台灣民眾對台語口音的態度。該研究調查的台語口音，分為兩大類：母語口音、次母語口音。次母語口音在詞彙和句法，常受到華語影響，但使用者的台語仍然相當流暢。¹⁰在台灣，台語幾乎從未受過政策面的積極支持，也從未建立起任何形式的標準口音，甚至在獨尊華語的國語運動下，遭受各種打壓。且台語目前處於復振階段，從語言保存的角度來看，對於次母語口音應該採取開放心態。畢竟在華語長期強勢的台灣，年輕一輩的台語幾乎無法避免受到華語影響，而拓展年輕使用人口對語言復振來說，也是重要的目標。該研究的受試者，無論年長或年輕世代，也都高度同意台語很重要，需要好好傳承。但是，標準語文化，還是影響了受試者對台語口音的態度。這些受試者，對台語次母語口音的接受度還是明顯低於母語口音。也就是說，即使台語仍然面臨語言流失問題，台語使用者還是相當程度上抱持著語言純化主義 (linguistic purism)，難以接受「不純正」的台語。

除了最初由上而下推行的標準語文化，社會環境也會傳遞語言的意識形態和刻板印象。Lippi-Green (1997) 分析了迪士尼公司出品的 24 部電影，並且從語言及角色定位的角度，分析這 24 部電影中的 371 個角色。其中，使用非母語口音的英語者，只有 15%，但是，其中的 40% 都是負面的角色。而母語為美國英語的角色，占了所有角色的 46%，但其中負面者只佔了 20%。另外，講非裔美國英語 (African-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 的角色、講美國南方英語的角色……等，也都普遍伴隨了負面的刻板印象，如失業、或是搭配非人型的角色，如動物、擬人化的物品等等。整體來說，形象正面有活力，且人生之路開闊多元的角色，幾乎都是講主流的美國英語。而形象負面的角色，講的英語大多是和特定族群、地區連結，較邊緣化的英語。Lippi-Green 這個研究所分析的迪士尼動畫電影，年代橫跨了將近六十年，

¹⁰ 如華語的「風很大」的「大」翻譯成台語，母語講法是「透」(thàu)，但次母語人會直接沿用「大」(tuā)。

從 1938 年的《白雪公主》到 1994 年《獅子王》，這凸顯了語言刻板印象，長期透過電影角色傳達給觀眾，而兒童因為和外界的連結有限，這樣的潛移默化就可能讓兒童從小就產生了對不同口音的刻板印象。

台灣過去強勢的國語運動以及獨尊華語的政策已經改變了，解嚴之後也出現本土語言復振的運動，甚至在教育政策和官方資源上也發展出了部分的成果（Khoo 2019）。但是，台灣各種語言和口音，早已建立了在社會上的刻板印象。現在台灣的影視作品中，無論是原創作品或是翻譯配音的作品，角色的語言選擇，幾乎還是照著過去的刻板印象走，講台語或台灣國語的角色不外乎是年長者、丑角、底層勞工、黑道。這種長期潛移默化的效果，相當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什麼未曾經歷國語政策雷厲風行時期的台灣年輕人，對台灣國語、台灣華語、外省第二代華語這幾種台灣的華語口音的態度，仍受到過去的刻板印象影響。

8.2 華語在年輕世代心目中的功能性依然高於情感性

目前台灣的年輕世代，不但皆為華語世代，其中許多人的母語就是華語。這個現象在經歷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的社會當然很普遍，也成為本土語言復振的一個阻力。但是，本研究的結果卻顯示，華語對台灣年輕人來說，仍然是功能性大於情感性。

本研究針對口音提出的問題中，社會聲望和語言能力都是功能甚至功利取向的類別。從表一的事後比較配對欄位中可以發現，除了台灣國語之外，所有口音在社會聲望和華語能力這兩類得到的評價，都高於社交吸引力。

華語在台灣的時間只有七十幾年，且一開始就是由上而下的推行，在各個公領域中，華語一直是以高階語言（H language）的角色存在。簡單地說，在社會上要保有一定的地位，或是要往上爬，就需要「好」的華語能力。在雷厲風行的國語政策影響下，加上因此而形成的標準語文化，這個「好」，就是標準國語。

當然，標準口音在功能取向的評價高，是相當常見的情形。Coupland and Bishop (2007) 針對英國 34 種不同口音的英語進行語言態度的調查。結果顯

示，只有四種口音，在社會聲望的評價高於社交吸引力，其中就有三種是偏向標準口音的英語口音，分別是倫敦英語（London English）、女王英語（Queen's English）、標準口音英語（standard accent English）。¹¹Zhang (2013) 也曾針對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的學生進行英語口音的態度調查，結果也是顯示，社會聲望評價最高的前三種口音，為美國英語（American English）、英國標準口音英語（RP）、澳洲英語，都是內圈（inner circle）英語，這裡的內圈，是由 Kachru (1985) 提出，指的是以英語為大部分人民的第一語言或母語的國家。¹²

但是，若比較各口音在社會聲望和社交吸引力得到的評價，就可以有較細緻的發現。上述 Coupland and Bishop (2007) 的評價指標，最低為 1 最高為 7。結果在調查的 34 種英語口音當中，有 30 種口音在社交吸引力得到的評價高於社會聲望。這個結果似乎也顯示出民眾對非標準口音，有比較強的情感評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 30 種英語口音在社交吸引力和社會聲望得到的評價，差異都不大。其中的 24 種口音，評價差異都低於 0.6，差異大於 1 的只有兩種，而且最高為 1.3。Zhang (2013) 並未提供各英語口音得到的評價值，僅提供排序，但八種口音當中，也有六種在社會聲望和社交吸引力的排序是一樣的。

本研究的五種華語口音，則是除了台灣國語之外，都是社會聲望的評價高於社交吸引力，也就是功能性高於情感。至於這兩個面向得到的評價差異，除了台灣國語為 0.3 之外，都是 0.6 或 0.7，較 Coupland and Bishop (2007) 為高。且 Coupland and Bishop (2007) 的評價指標為 1 到 7，較本研究的 1 到 5 為廣，也就是說，若將兩個研究的指標換為一致的標準，本研究 and Coupland and Bishop (2007) 的差異會更大。

由此可判斷，對台灣年輕一輩而言，華語的功能性還是高於情感性，且兩者的差異仍然相當明顯。在功能性的驅使下，標準口音就相形重要了。而

¹¹ 第四種為德語口音英語（German English），但德語口音英語在社交吸引力和社會聲望這兩部分的評價差距僅有 0.01，因此暫時擱置討論。

¹² 詳細說明請見本文 8.4 節。

台灣年輕人對於台灣國語表達的高度情感認同，相當程度上可能也反映了對台語的態度。這個對台語的情感支持，和 Hsu (2018) 直接問卷中年輕一輩的調查結果是吻合的。只是，願意將對台語在情感上的支持轉化為實際行動使用台語的年輕人，似乎仍是少數。

8.3 華語在台灣的地性認同

除了前述兩個較保守的語言態度之外，本研究的結果也呈現出一些新的語言態度或現象。可從年輕一代對台灣華語和中國華語的態度來了解。

首先，台灣華語得到的評價相當高。外省第二代國語得到的評價雖大多普遍高於台灣華語，但外省第二代國語畢竟是特定世代的口音，且目前的使用者也已逐漸步入老年，因此外省口音的影響力消失是可預期的，而台灣華語在台灣的语言地位也可預期地更加穩定。

此外，台灣華語在每一個面向的表現都相當穩定，並未像台灣國語和外省第二代國語那樣，在「親切」面向得到的評價和其他面向相反。且台灣華語在社會聲望和社交吸引力兩類得到的評價，差異也小，平均只有 0.3 的差異，是本研究五個口音當中差異最小者，其他四種口音的差異皆為 0.6 或 0.7。顯然，華語在台灣的角色，已經從功能取向的外來語言，進一步走向得到認同的在地語言。

另一方面，在國語運動時期帶有些許神秘但又有「正統」、「標準」形象的中國口音華語，無論是中國北方口音，或是中國南方口音，在年輕台灣人的心目中，並沒有特別高的評價。

中國華語未獲高度評價，加上台灣華語的穩定，似乎顯示出，在台灣年輕人心中，華語的「中國性」不再那麼明顯，而華語的「台灣性」也增加了。甚至還有強調台灣主權的臉書專頁，曾經發文建議網友，對外國人自我介紹時可以說，*I am from Taiwan. I am Taiwanese. I speak Mandarin.*¹³該文主張

¹³ 2019 年 1 月 23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PassportSticker/photos/a.1470612246581878/1477641505878952/?type=3&theater>

使用 *Mandarin* 一詞，而不是 *Chinese*。除了因為 *Chinese* 和中國的連結和政治性之外，還提到「到了今天已經被內化成具有台灣特色的語言，跟「普通話」起源地中國的「普通話」已經有相當程度的出入」。

除了口說的華語，當年國語政策強力推行的注音符號，似乎也成為一種「台灣性」的表現。陳輔軒（2019）以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分析架構為根據，探討了在消費文化及網路科技的普及後，注音符號成為台灣人特有的網路身分標示。簡言之，注音符號已從國語（中國）代表，轉變成為台灣日常。顯然，華語在台灣的在地化，已經從語言形式的層面發展到社會層面。¹⁴

8.4 兩個語言規劃的問題

台灣華語在社會層面的在地化，也讓台灣的語言規劃面臨了兩個問題。第一，是台灣華語的定位；第二，是對本土語言政策的衝擊。

首先，既然台灣華語已經在年輕世代間，相當程度上發展出台灣性，那麼台灣社會應該更正視台灣華語在華語體系中的定位問題。這個問題，或許能夠以英語做為參考。

Schneider (2007) 從語言發展和社會互動的角度，提出五階段論，說明英語到一個新的地區後的發展。這五個階段依序是，奠基期（*foundation*）、規範外部穩定化（*exonormative stabilization*）、本土化（*natvization*）、規範內部穩定化（*endonormative stabilization*）、分化期（*differentiation*）。越到後面的階段，在地化的程度越高。若從 Schneider (2007) 的角度來看，台灣華語在建立了台灣性之後，可說已進入第五個階段。¹⁵

除了 Schneider 的五階段論，Kachru (1985) 也針對世界上的英語分類，提出了同心圓理論。這個同心圓共有內圈（*inner circle*）、外圈（*outer circle*）、擴散圈（*expanding circle*）。內圈的英語為英國以及美國、澳洲、紐西蘭、

¹⁴ 如本文 3.4 小節所回顧的相關語言學研究成果。

¹⁵ 萬宗綸（2017）則認為「新華語」（即本文所稱之台灣華語）要進入第四階段，即四個階段「規範內部穩定化」。

加拿大……等這些在英語人第一次離散（1st diaspora）遷徙地的英語。目前在這些地區，英語是大部分人士的母語。外圈的英語則是英語人的第二次離散（2nd diaspora）形成的英語口音，這次的離散大多是隨著殖民勢力。外圈的英語如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奈及利亞等地的英語。英語在這些地區，大多是官方語言（之一），並且是許多民眾的第二語言。至於擴散圈的英語，則是和英語的歷史和政治脈絡無關，而是定位為外語，如台灣、日本、中國、韓國等地的英語。從這樣的分類來看，越內部的圈子，英語的母語性就越強，在教學上也就更符合學習者對「標準」的期待。

華語在全球擴散的歷史當然不如英語這麼久，擴散的範圍也沒有英語這麼廣，但上述 Kachru (1985) 的同心圓分類模型，或許可以做為台灣華語定位的參考。台灣華語當然不屬於擴散圈，但是，究竟是屬於外圈還是內圈？

在國語運動時代，似乎中國的華語才能放在內圈，也才是「標準」的華語。¹⁶但是，台灣華語在形式上和認同上已經在地化，也成為台灣最強勢的語言，且台灣也自我定位為華語輸出國。

從客觀條件來看，台灣華語也應該是屬於內圈的華語了。但是，如本文 3.6 小節所描述的狀況，在台灣卻似乎還相當普遍。此外，目前在各級學校的國語演講比賽、或是部份官方的華語新聞廣播，也都還是有早年推行「標準國語」時強調的發音，最常見的就是較台灣華語明顯的捲舌音和強調降升調型的第三聲。甚至教材中都還會出現兒化韻，而且是稱這些特徵為「標準口音」。如此一來，台灣華語似乎又變成不標準口音。

面對這種矛盾的狀況，台灣的語言政策，無論對內或對外的華語教學，對於「標準」的認定，必須要有清楚的方向，且應該以台灣華語為根據。

除了台灣華語的定位問題之外，確立台灣華語的地位，對於本土語言勢必會造成衝擊。雖然華語在台灣本土化，主要原因是長期獨尊華語，且這些本土語言的流失，也是獨尊華語的政策所致。但是，目前在台灣，絕大多數人都是受華語教育且長年生活在華語環境中，且華語在台灣有極高的溝通

¹⁶ 在這個脈絡下不再細分各地口音。

功能。能夠從社會正義的角度，也就是回到歷史和社會脈絡下看待本土語言復振的人，為數並不多。

過去，本土語言和華語最明顯的差異，或許就在於本土性和外來性。但當台灣華語已逐漸從形式上和情感上都擺脫外來性，並且建立本土代表性之後，本土語言的本土性優勢也會受到很大的挑戰，對本土語言的語言規劃，是一大衝擊。

9. 結論

本研究調查台灣年輕人對五種華語口音的態度。結果顯示，這些未曾經歷過國語運動的年輕世代，對於中國的華語口音，並未有明顯的正面態度。但是，過去長期以來的刻板印象似乎還是影響了這些年輕人。對台灣年輕世代來說，外省第二代國語和台灣國語，依然是對立的存在。台灣國語在「親切」面向上獲得最高的評價，但是在其他面向的評價則都是最低。而外省第二代國語獲得的評價，則完全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華語在各個面向都得到正面評價，顯示華語在台灣的地化，已經從語言層面發展到社會層面，成為台灣年輕人的語言認同。這個現象，進一步引發兩個關於語言規劃的議題。第一，是台灣華語的定位。本文認為，既然台灣華語在語言層面和社會層面都發展出在地性，台灣的華語政策，無論對內或對外的華語教學，應該清楚地以台灣華語作為參考的「標準」，而非游移於中國華語和台灣華語之間。第二個議題，是對本土語言政策的衝擊。台灣華語在年輕人之間已經發展出本土性，傳統本土語言的「本土性」優勢，勢必受到挑戰。本土語言政策在規劃和執行上，或許也該調整本土語言的定位。

引用文獻

- Abrams, Dominic and Michael A. Hogg. 1987. Language attitudes, frames of reference, and social identity: A Scottish dimens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6: 201-213.
- Cheng, Robert L. 1985.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 *Language* 61.2: 352-377.
- Coupland, Nikolas and Hywel Bishop. 2007. Ideologised values for British accents.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1.1: 74-93.
- Fon, Janice and Wen-yu Chiang. 1999. What does Chao have to say about tones? a case study of Taiwa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7.1: 15-37.
- Fon, Janice, Wen-yu Chiang, and Hintat Cheung. 2004.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two dipping tones T2 and T3 in Taiwa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2.2: 249-280.
- Fon, Janice and Keith Johnson. 2004. Syllable onset intervals as an indicator of discourses/syntactic boundaries in Taiwan Mandarin. *Language and Speech* 47.1: 57-82.
- Fon, Janice and Hui-ju Hsu. 2007. Positional and phonotactic effects on the realization of dipping tones in Taiwan Mandarin. In Thomas Riad and Carlos Gussenhoven (eds.), *Phonology and Phonetics, Tones and Tunes, Vol. 2. Phonetic and Behavioural Studies in Word and Sentence Prosody*, 239-270.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su, Hui-ju. 2018. The Entanglement of emotion and reality: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Taigi.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9.1: 76-91.

- Hsu, Hui-ju and John Kwock-ping Tse. 2009. The tonal leveling of Taiwan Mandarin: A study in Taipei.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5.2: 225-244.
- Kachru, Braj. B. 1985. Standard, 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In Randolph Quirk and Henry G. Widdowson (eds.), *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11-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hoo, Hui-lu. 2019. The dynamics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From Southern Min dialects to “Taigi”. In Chris Shei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Discourse Analysis, 1st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ubler, Cornelius. 1985. *Th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 Taipei: Student Book Co.
- Kuo, Yun-hsuan. 2005. *New Dialect Formation: The Case of Taiwanese Mandarin*. Essex: University of Essex dissertation.
- Ladegaard, Hans J. and Itesh Sachdev. 2006. ‘I like the Americans...but I certainly don’t aim for an American accent’: Language attitudes, vitalit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Denmark.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7.2: 91-108.
- Lambert, Wallace E., R. Hodgson, Robert C. Gardner, and Samuel Fillenbaum. 1960. Evaluational reactions to spoken languag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 44-51.
- Lippi-Green, Rosina. 1997. Teaching children how to discriminate. In Rosina Lippi-Green (ed.), *English with an Accent: Language, Ideology,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79-10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ilroy, James. 2001.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standardizatio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5.4: 530-555.
- Robert, Elen. 2009. Accommodating “new” speakers? An att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L2 speakers of Welsh in south-east Wa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195: 93-116.
- Schneider, Edgar. 2007. *Postcolonial English Varieties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nford, Donald.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Contact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 Zahn, Christopher J. and Robert Hopper 1985. Measuring language attitudes: The speech evaluation instrument.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4: 113-123.
- Zhang, Qi. 2013. The attitudes of Hong Kong students towards Hong Kong English and Mandarin-accented English: What ar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Englishes, in particular, Hong Kong English and Mandarin-accented English? *English Today* 29.2: 9-16.
- 王甫昌. 2001. 〈台灣族群通婚與族群關係再探〉。劉兆佳、尹寶珊、李明、黃紹倫編《社會轉型與文化變貌》，393-43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任承英. 1999. 〈語言腔調感知及其主觀評價之研究〉。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江素華. 2010. 〈台灣國語的語音特色發展與教學〉。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碩士論文。
- 何萬順. 2009a. 〈台灣華語與本土母語：衝突抑或相容〉。《海翁台語文學教學季刊》3: 25-39。
- . 2009b. 〈語言與族群認同：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語言暨語言學》10.2: 375-419。

- 姚榮松. 2000. 〈論台灣閩南方言詞進入國語詞彙的過程〉。《華文世界》15.5: 635-662。
- 許慧如. 2014. 〈在族群與語言接觸下形成的台灣華語——從聲學分析的結果看起〉。《語言暨語言學》15.5: 34-46。
- 陳淑嬌. 2007. 〈臺灣語言活力研究〉，鄭錦全、何大安、蕭素英、江敏華、張永利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陳輔軒. 2019. 〈中國創造·臺灣變造：注音符號的接合與實踐斷裂〉。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 黃宜範.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出版社。
- 黃英哲. 2007.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台北：麥田出版社。
- 曾心怡. 2003. 〈當代台灣國語的句法結構〉。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曾金金. 1999. 〈兩岸新聞播音員語音對比分析〉。台北：國科會技術報告（NSC 88-2411-H-003-017）。
- 萬宗綸. 2017. 〈關於「國語文」的 N 種思考：大考國文作文爭議〉，鳴人堂。2019 年 1 月 25 日，取自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9881/2285823>。
- 鄂貞君. 2002. 〈台灣地區民眾對目前語言教育政策所持之態度及其語言族群忠誠度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與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董忠司. 1995. 〈台灣漢語方言影響下的若干「國語」聲母變體初稿〉。《語文學報》2: 3-28。
- 蔡仲茵. 2014. 〈北高地區大學生對國語和臺語之語言態度調查〉。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論文。

鄭安秀. 2009.〈台灣語言使用與態度初探——以台北、高雄兩地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韓石泉. 1956.《六十回憶》。台南：韓石泉逝世三週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

許慧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hsuhj@ntnu.edu.tw

The Language Attitudes in Post *Guoyu* Movement Era in Taiwan — A Study of Taiwanese Young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Five Mandarin Varieties

Hui-Lu KHOO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young Taiwanese’s attitudes towards five Mandarin varieties—2nd-generation *Waisheng* Mandarin, Taiwan Mandarin, Northern Chinese Mandarin, Southern Chi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Mandarin. The first four, if contextualized in the long-term “Standard *Guoyu* Movement” in Taiwan, can all be considered “standard” Mandarin.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stereotypes towards Mandarin form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Standard *Guoyu* Movement remain among young Taiwanese people. Results showed 2nd-generation *Waisheng* Mandarin remains best evaluated in all categories except “Intimacy”, while TaiwanESE Mandarin was evaluated in a reverse manner. Chinese Mandarin varieties were not highly evaluated. Meanwhile, Taiwan Mandarin was stably highly evaluated in all categories; the gap between social attractiveness and function of Taiwan Mandarin was the smallest among the five varieties.

Key words: language attitude, Taiwan Mandarin, Mandarin varieties,
Taiwanese Mandarin, verbal guise technique

